

試以漢代音樂文獻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音樂史（七）

——討論漢代擊奏樂器與西南夷民族樂器

陳萬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
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研究所教授

三、漢代西南夷樂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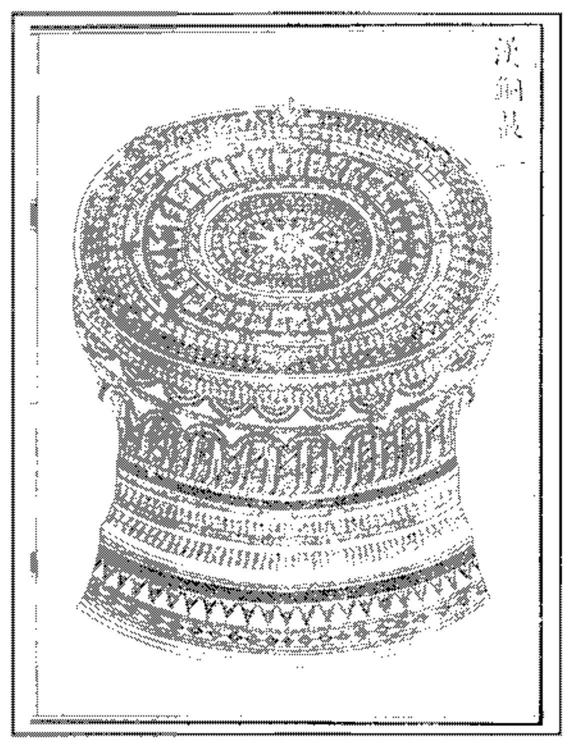
(二)銅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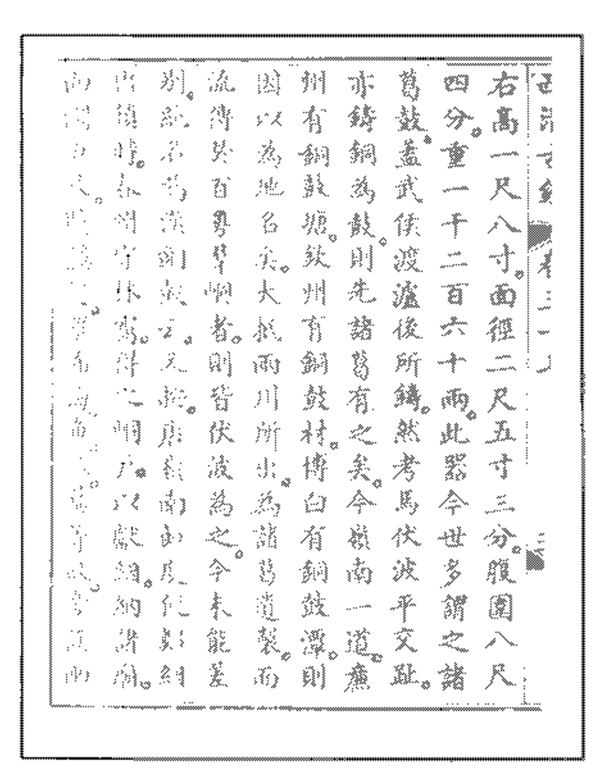
銅鼓　銅製的擊奏器樂，可能是由炊具——「銅釜」演變而來，因流傳於漢代南方及西南少數民族間，故附會為「伏波鼓」或「諸葛鼓」，統名「漢銅鼓」(圖二四)。諸葛亮是三國蜀相，世人耳熟能詳；「伏波」為東漢馬援，事光武帝劉秀破隗囂，又受命征零羌，肅清隴右，平交阯，威震南服，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他的名言：「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諸葛亮與馬援都有事功於漢代西南地區，當地人奉為神明。

銅鼓（圖二五）的主要材質為銅、錫、鉛（少數原料中所含砷、銻、硫、鋅、鐵等雜質）合金鑄成，為青銅器之屬。銅鼓腔中空，無底，兩側有「耳環」，鼓面有「光體」與「銅雕飾」，鼓身有「紋飾」(圖二六)，因鼓式不同，各有定式。銅鼓一般直徑為五〇～一〇〇公分之間，也有最大的一六五公分，最小的二〇餘公分，算是例外。

銅鼓在春秋初期已出現，盛行於西漢，沿至唐代，直到宋代仍有鑄造。現在，主要在雲南、廣西兩省，次及廣東、貴州、湖南三省的壯族、瑤族、苗族、侗族、黎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彝族、佤族等少數民族，這些民族的人民非常喜愛銅鼓，而且銅鼓還傳播於東南亞一些國家。銅鼓不但是樂器，在他們重要節日婚喪喜慶中擊奏，增添氣氛；還作為儀式中「禮器」、婚配中「媵器」(嫁粧)、迎逢中「贈品」(送來送去)、陪葬中「明器」，同時因為無底敞口，反置時可以當「儲器」(貯貝器)，甚至逕作「炊器」，也有一件銅鼓的銘文「人旺財興」，如此，銅鼓應算是一種多用途的民族性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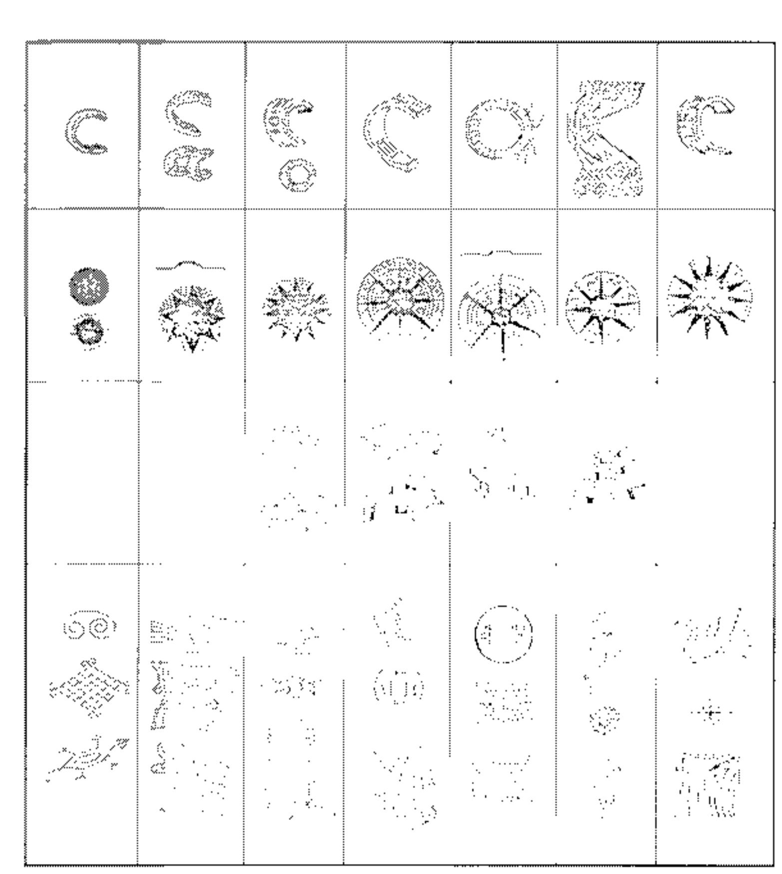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共出土西漢時期銅鼓十七面，同時又出土與銅鼓類型相似——但將鼓底封閉，改進鼓面成為活動蓋子的「貯貝器」——小而言之「撲滿」性質，大而言之「錢櫃」(圖二七)。這物件與銅鼓有著密切關係、它曾將銅鼓在當時擊奏及運作的情形，用銅雕飾活潑生動展示出來；貯貝器有各種式樣，共出土三十一具。石寨山出土的銅鼓較大最完整的，是十四號墓編號(M14: 1)的銅鼓，通高三一公分，鼓面直徑四一公分。胴部與腰交界處，有四個繩紋耳。鼓面中央作十角光芒，每角之間夾以復線三角紋，其外作雙行連續圓圈紋一周，主暈最寬，作長喙飛鳥（翔鷺紋）四





右高一尺八寸。面徑二尺五寸三分。腹圍八尺四分。重一千二百六十兩。此器今世多謂之諸葛鼓。蓋武侯渡瀘後所鑄。然考馬伏波平交趾。亦鑄銅為鼓。則先諸葛有之矣。今嶺南一道。廉州有銅鼓塘。欽州有銅鼓村。博白有銅鼓潭。則固以為地名矣。大抵兩川所出。為諸葛遺製。而流傳於百粵閩者。則皆伏波為之。今未能甚別。[illegible]

▲圖二四　清．《西清古鑑》「漢銅鼓」書影



▲圖二六　銅鼓「耳環」「光體」「銅雕」「紋飾」圖

箋，最外為三角齒紋及圓圈紋組成帶紋一周。胴部上端作三角齒紋及圓圈紋帶紋一周。下端作羽人划木船者（船紋）四組，腰部作戴羽武士（執干羽人紋）八組，每組一至二人，手中持有兵器和盾形物。足部亦有三角齒紋及圓圈紋組成帶紋一周，鼓面沒有蟾蜍。以羽人木船圖形為裝飾的銅鼓，應屬於早期形制（圖二八）（《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七九頁）。

近數十年來大陸收藏的銅鼓已達一千五百餘面，由科學發掘出土者五十餘面，學者專家根據鼓型特徵分為下列八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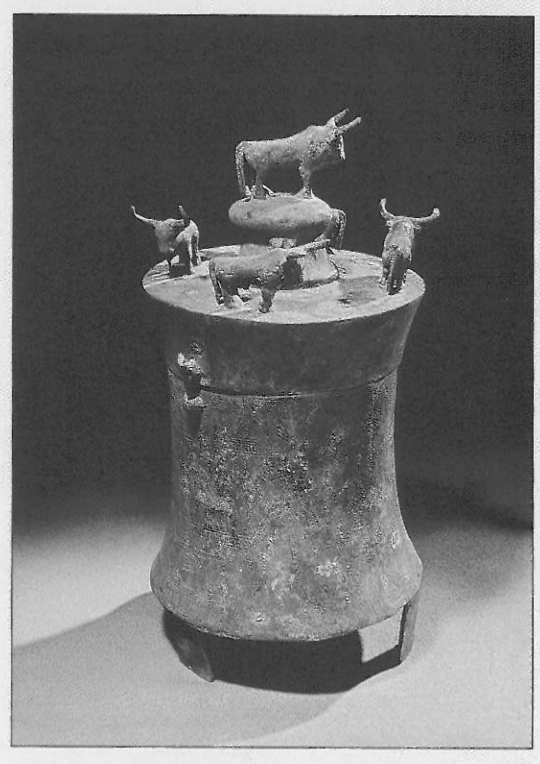
一、雲南省楚雄縣「萬家壩型」（春秋戰國時代）。

二、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型」（戰國—秦漢時代）。

三、廣西省滕縣「冷水沖型」（秦漢唐五代時期）。

四、廣西省北流縣「北流型」（春秋


▲圖二五　石寨山型銅鼓（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出土）


▲圖二七　雲南川江李家山十七號墓出土五牛一鼓貯貝器

一唐五代時期）。

五、廣西省靈山縣「靈山型」（秦漢一宋朝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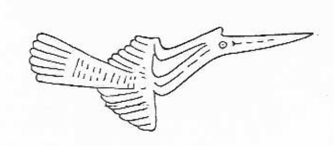
六、貴州省遵義縣「遵義型」（五代一元朝時代）。

七、貴州省麻江縣「麻江型」（宋朝一清朝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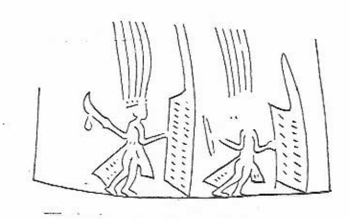
八、雲南省西盟縣「西盟型」（唐五代一清朝時代）。

銅鼓的發祥地，大部分人共識傾向於雲南中部偏西地區，指楚雄萬家壩出土的銅鼓，是目前所知最原始的銅鼓。後來銅鼓傳到滇池地區（晉寧），得到發展而趨於成熟，然後再沿著巨川大河向東（廣西）、東北（貴州）呈扇形方向傳播開來，遠及東南亞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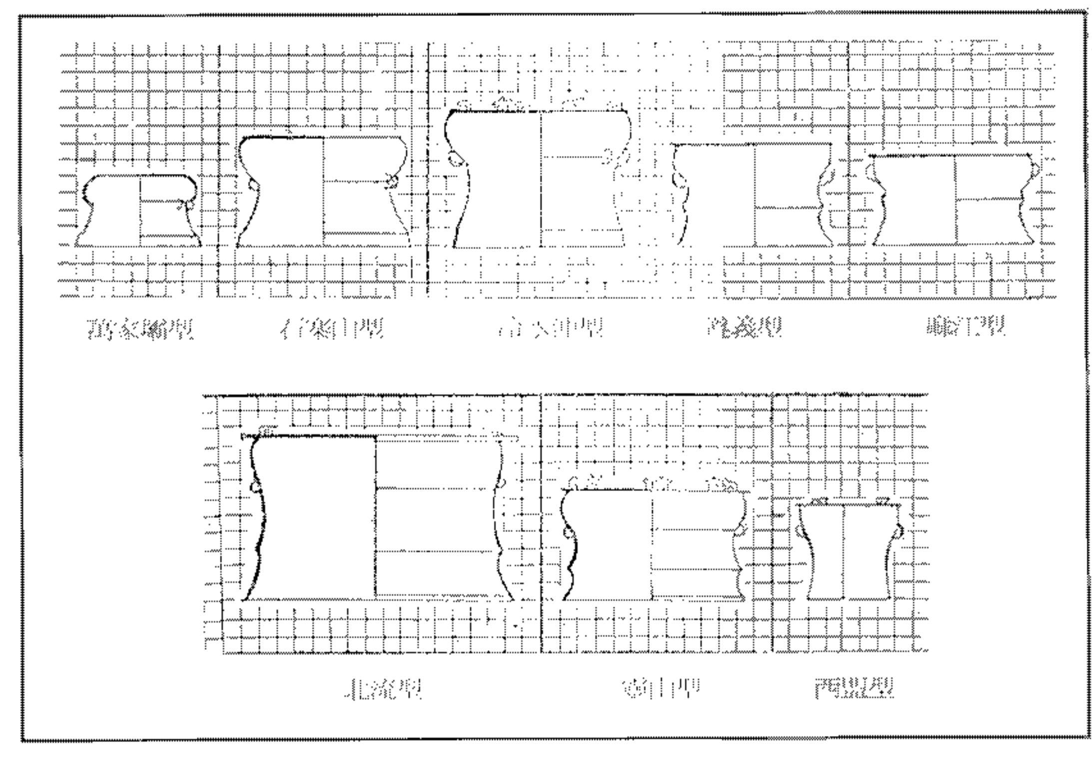
以上八種銅鼓類型（圖二九），可以根據製圖方格比例間數，看出其體積大小，部位高低，鼓面雕飾等識別，極有幫助，可見銅鼓研究已達於相當學術水準了。


雲南晉寧銅鼓翔鷺紋（M14:1）


晉寧銅鼓船紋（M14:1）


晉寧銅鼓執羽舞人紋（M14:1）

▲圖二八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四號墓出土銅鼓紋飾三種



▲圖二九　各類型銅鼓構體標準圖式

蔣廷瑜《銅鼓藝術研究》載有吳崇基一幅鑄造銅鼓圖畫，所鑄的銅鼓相當巨大，用合范法。鼓的附件蟾蜍，耳環等也是合范，也似參用「脫臘法」，然後用銲接上去。這鑄造的銅鼓是屬「靈山型」。鑄成的初胚，十分精細（圖三十），紋飾附件極其優美，所耗時間與金錢諒亦不少。

一面銅鼓能值多少錢？在明朝萬曆年間（十六世紀中葉），有一則驚人但唯一的記錄。《明史》卷二一二〈劉顯傳〉：都掌蠻酋阿大言：「鼓聲宏大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牛）……」，且「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無論「千牛」一鼓，或是鑄造費極高，在當年都不是問題，就銅鼓的歷史研實觀察，它代表的是恒遠的精神價值，不能用物質換化，因它被視為「神器」，代表權威與財富的實力。

現代銅鼓演奏方法，可以用一面單獨演奏，或多面聯合演奏，鼓擊可分平擊式（鼓平放）、側擊式、側懸式，或挎在身上數種；擊時用手，用槌，或數人同擊、輪擊、競擊；還有在側懸式擊奏時的鼓底，由一人用木桶合攏部分音響，然後擺動，對於音響控制，音量高低與音色變化，多少有點幫助。

銅鼓也有《銅鼓經》，相當於京劇的《鑼鼓經》，即演奏銅鼓的節奏譜。有些專家將貴州省普定縣布依族的「銅鼓經」，用國語讀音法，將它紀錄成鼓譜四段十二節，本稿節錄其中一節，以見其梗概：

卓照，照卓照。卓整照而卓整照。且整照而卓整照。且整照而卓整照。

這段「鼓譜」應用到的國字，計有「卓」、「照」、「整」、「而」、「且」等五個音值，是銅鼓打擊的聲音代號，如「卓」是指鼓槌打在銅鼓中心偏下方的部位，竹棍打在皮鼓的中心。「照」是鼓槌打在銅鼓心中的光體上，竹棍打在皮鼓的中心，「整」是鼓槌打皮鼓中心。……其餘共十餘音的演奏，茲不一一敘述。

布依族還有世代相傳的「銅鼓曲」，在本世紀八十年代保存一首〈角雕聚分雲〉歌十二段，其第一段國字讀音：

代五一三樣，先雲，坐雲，
三樣，哪，更，哪，哪嗎，
更照借，照了。

這首歌恕未詳其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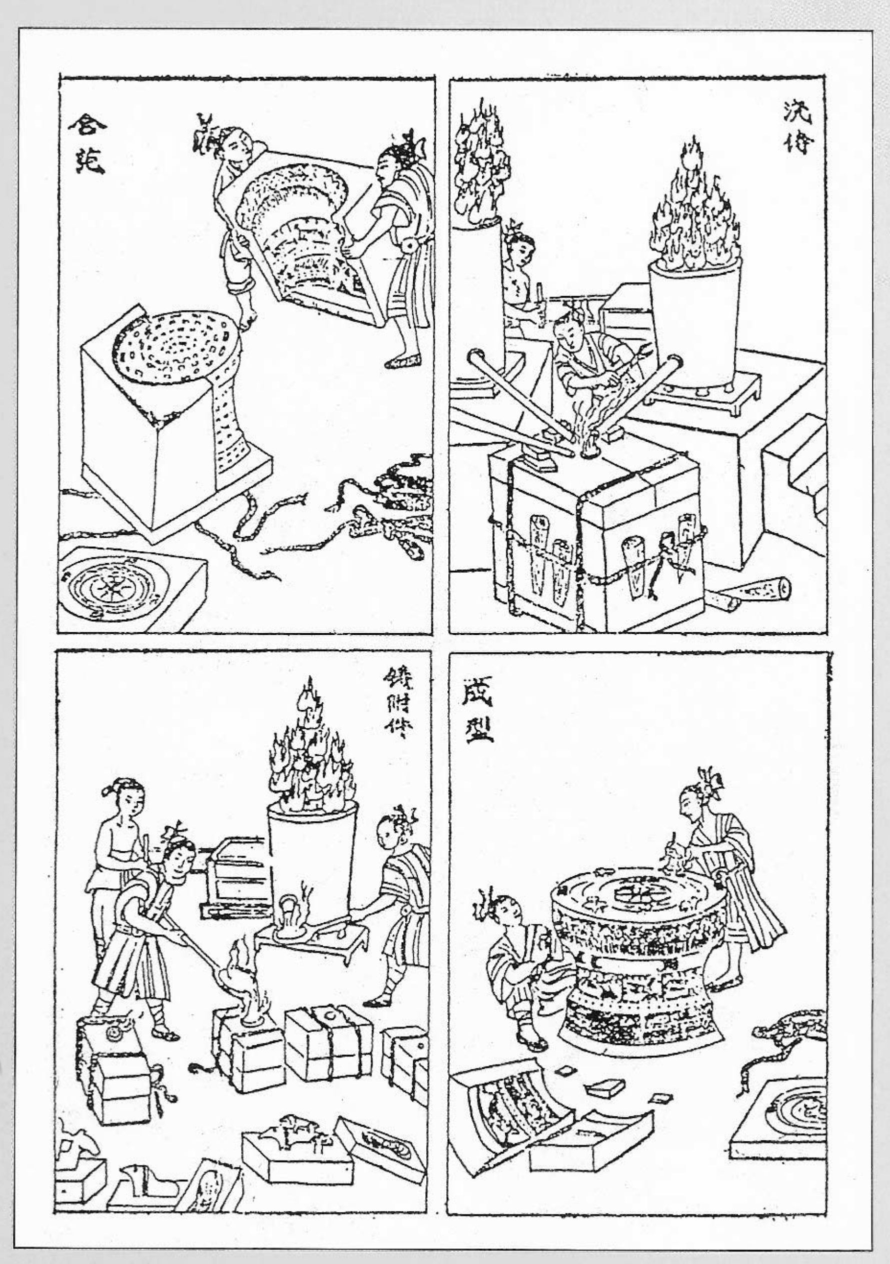
銅鼓有雌雄、公母之分，據清人屈大鈞《廣州新語》記載：先煉者為雄，後煉者為雌。鼓成請銅鼓調音師調音，先用藥撒在鼓臍與四旁，加熱後待冷，試敲十幾槌就調好了音，於是「雄聲洪而亮，雌聲清而長，和諧有情，餘音搖風，若龍吟而嘯風也。」一九八七年廣西省河池地區民族歌舞團，研製了一

套系列定音銅鼓，是具有半音齊全的十六面現代仿製銅鼓，以現代民樂（國樂）方式演奏，隨時代而注入了新的生命（以上多取材自《廣西壯族的鼓音響的研究》，劉客餐碩士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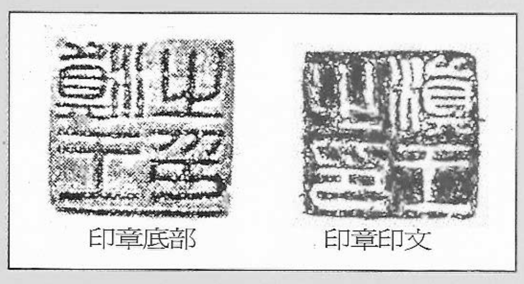
（三）漢代銅鼓演奏標本

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葬群，於一九五六年開始先後發掘三次，共清理三十四座墓葬。這些墓葬與土坑墓相似，多數夾在大石頭旁，或是大石當中，屍體全然腐化，亦不見棺槨痕跡，殉葬品放在木箱內，出土近四千件以銅器爲主的文物。在第二次發掘中，出土「半兩錢」、「五銖錢」、「銅鏡」等，俱是西漢時期遺物，證明這些墓葬年代，是由戰國末期就開始了。尤其第六號墓出土金質「滇王之印」（圖三一），《史記》<西南夷列傳>載漢武帝劉徹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年）：滇王始降於漢，漢「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應是此印，印證了《史記》、《漢書》、《後漢書》關於滇王史事的記載。六號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代滇王，自武帝後，「滇王」這一名號不再出現，則此墓葬群下限年代可想而知了。這座滇王墓，還出土了鐘、鼎、玉器等文物，顯然受漢族文化影響深遠，尤其「玉衣」的殘片出土，證明他仍保持中原「厚葬」之風（<晉寧石寨山出土有關奴隸社會文物>，雲南省博物館撰，一九五九年，文物，五期，五九～六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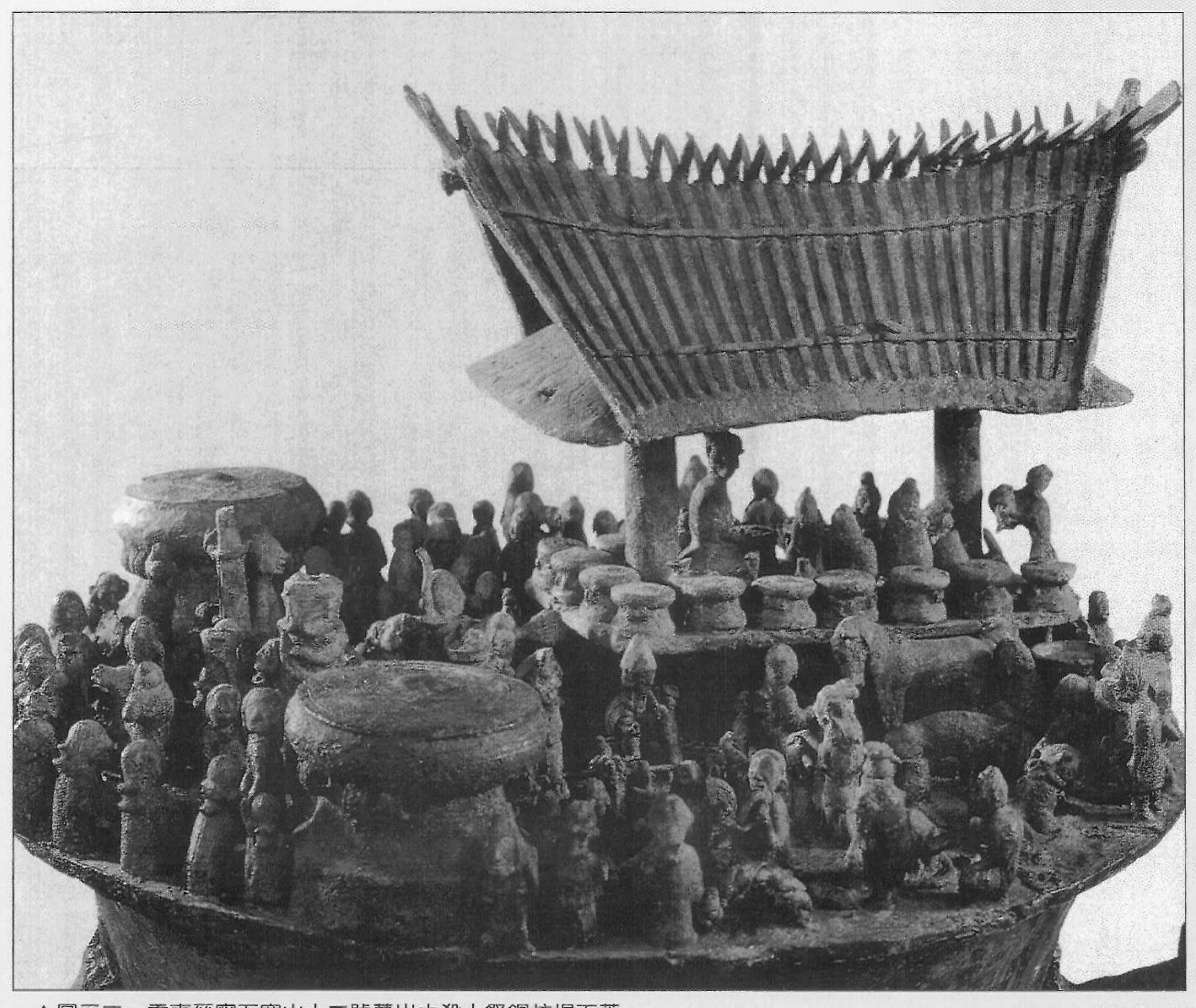
晉寧石寨山出土銅鼓外，在音樂方面最有價值的文物，應推十二號墓出土「殺人祭銅柱場面蓋、虎耳細腰銅貯貝器」（圖三二），編號（M12:26），通高五三公分，蓋子直徑三二公分。貯貝器就是「撲滿



▲圖三十　銅鼓鑄造作房工作狀



▲圖三一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六號墓出土「滇王之印」模



▲圖三二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二號墓出土殺人祭銅柱場面蓋

」，盛錢用的銅器，它承襲了銅鼓作爲重器的職能，象徵權力與財富的統一。因此，便不惜用一切藝術技法——銅的立體雕塑——呈現三度空間，將當時國家大事如祭祀、戰征、民族精神表徵，都裝飾在「貯貝器」的蓋子上；是我們研究滇池地區古代歷史，階級狀況，民族關係，生產規模，風俗習慣的直觀史料。殺人祭銅柱場面的貯貝器(其外觀請參見圖二七)，圓桶形，中腰收細，兩側有虎形雙耳，平底三隻獸爪足，器內貯有貝殼。蓋子上鑄有一百二十七人，每人高三至六公分。此蓋，尙有屋頂棚架雙柱建築一所，長約一四公分，寬九公分，還有銅柱、牲畜、猛獸等等。用「脫臘法」鑄成。

這種場面，在《發掘報告》中稱爲「殺人祭銅柱」；據馮漢驥研究，對若干主要人物活動形像試釋，稱這是「詛盟」儀式。「詛盟」與「要盟」是西南古代民族生活中極重要的制度，《華陽國志・南中志》：「其俗信巫鬼好詛盟」，凡有重要事件，都以盟誓來約束，盟誓時要舉行隆重儀式。此器有屋頂的平台，就是盟會所建的「壇」，有「主盟」與「耆老」、「邑君」列坐，並椎牛、刑馬、犧牲、立銅柱爲的標誌。

「殺人祭銅柱」的貯貝器，人物雖然錯綜雜踏，而主從仍是分明，布局嚴謹。器蓋以「干闌」式建築爲中心，前面敞開，左右有階梯十一級上下。此干闌式建築的主要

部分爲一平台，平台左、右兩邊各置銅鼓六面，後邊置銅鼓四面（共十六面），形成三邊銅鼓爲平台的邊欄。平台後邊有圓柱，圓柱前一高凳，一人垂足於其上，此種坐姿古稱「踞」，此人髮飾圓髻，雙臂亘鐲，腹前有圓鏡扣帶，此種形像疑爲「滇王」，故「高坐」異於常人。

此人之右而稍後有兩面銅鼓，後大而高，前則稍矮，鼓上放著烹煮用具。「滇王」之前靠左，一列五人背銅鼓席地而坐。平台前面靠右角地上置一大鼎，高與人齊，靠外邊有牛一頭，已宰殺倒地，數人作交談狀。平台前左角放一大鑊（鼎大無足），大小與鼎相同，鑊後有數人，似爲宰豬刑馬工人。平台之右靠器邊緣，有一隻老虎伏地，另一頭繫於銅椿上，有死狗一頭似爲飼虎之物，虎後立一人似爲看守飼虎者，虎前立一孔雀，一女子坐以蛇飼之，意在表示威武豪華？

平台的左邊，在虎與平台間，有樂器四組，其中三組已經脫落，鑄痕明顯存在。尚存一組爲銅鼓與錞于演奏（請參閱本稿二～(四)節<錞于>圖十三），這是難得一見真實的漢代銅鼓敲擊重要模型之一，可惜其他三組演奏銅雕脫落，無從推斷爲何種樂器？但屬於這項儀式音樂演奏，應無疑義。平台之後有相當距離處，左右有兩面巨大的銅鼓，約有一個半人之高，兩鼓之間立一銅柱，柱上蟠蛇兩條，一條已吞噬一人，尚留有人頭及胸部未完全吞沒，此蛇似是銅鑄，並非活生生的動物。在柱右立一圓頭如碑形式的牌，牌上縛著一個人，赤身裸體的男性，此處銅鼓二面與銅柱、碑形牌四種物件，與平台成正橫排列，正是踞坐的滇王背面。……（取材自<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動圖像試釋>，馮漢驥撰，一九六三年，考古，六期，三一九～三二九面及《馮漢驥考古學論文集》，一九八五年，文物出版社）。

以上是「殺人祭銅柱」貯貝器重要場面形像，在各據點間有犧牲的奴隸及各種不同身分人物裝束，情態畢具，非關本稿敘述重點，概予節略。本稿主旨爲銅鼓陳列與演奏，此僅三十二公分直徑（面積八〇四平方公分）器蓋，有一百餘人，銅鼓二十面，其巨大與小銅鼓滲雜，可以說是「銅鼓世界」，而且各鼓面朝上，倘若一聲令下鼓聲齊作，豈不是驚天動地，震撼山嶽。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我曾指導文化大學音樂研究所劉客發君，結撰碩士論文，題目《廣西壯族銅鼓音響的研究》，因爲我懂得一丁點音樂科技，要求劉君的論文於歷史、藝術之外，著重在音響方面。劉君遍訪「銅鼓的故鄉」，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攝影、錄影、錄音，參與民間銅鼓節（螞蜴節），以數位錄音機錄取多種銅鼓的聲音，經頻譜分析儀顯現圖像，實爲國內音樂論文之創作，顯示銅鼓科學之文明；雖在大陸也有少數專家做了此項工作，惟劉君用彩色圖版發表，頗爲完整，似是所長。茲將該論文「靈山型」銅鼓四種聲音測驗圖版列後（圖三三～三六），以見一個學生著作也夠認真，並非苟且取得「功名」（學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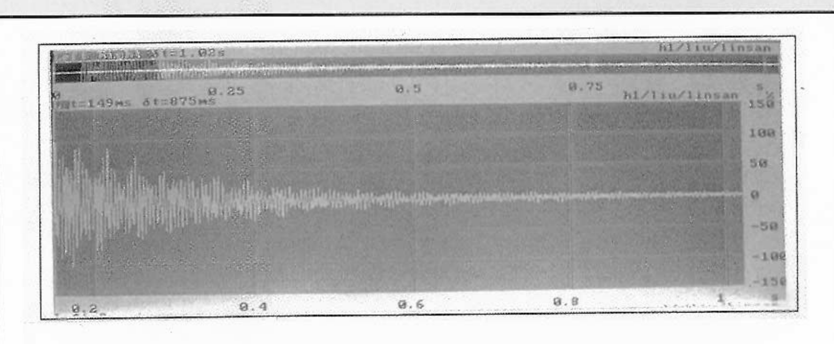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今越南北部）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用銅鼓的銅材鎔化作馬的模樣），還（回朝）上之（奉獻於皇帝）。」注：裴淵《廣州記》（宋人《太平御覽》卷七八五輯有此條）：『俚獠』銅鼓故事，即馬援將「越南式」銅鼓材料鑄成銅馬，還朝獻之，並進表奏《相馬法》，有詔置宣德殿下。馬援利用銅鼓鑄馬，無獨有偶，《晉書》卷二六<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當時幣制大者謂之「比輪」）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敗鑄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下限時代爲晉太元三年西元二五三年。這兩則是漢代銅鼓在正史中的資料。

(四)銅葫蘆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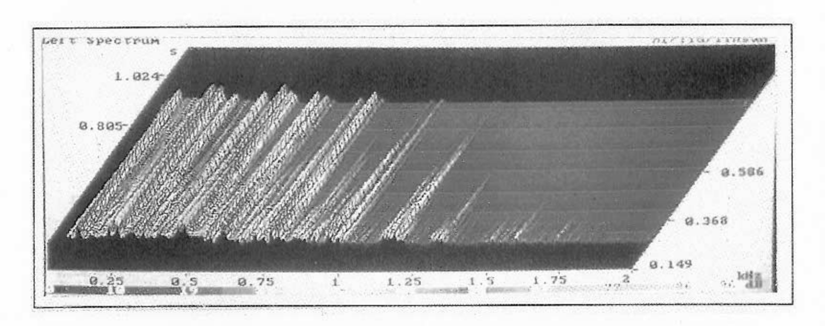
葫蘆笙　簧振動氣鳴樂器，是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如：彝、佤、怒、拉祜、傣、納西等族廣泛喜愛的樂器。它是用「瓠」（讀音「壺」或「護」）製成笙斗，斗上插五、六隻竹管（笙苗）或兩三隻竹管，還有的在竹管上又加葫蘆，以增加其發音量，竹管底端有簧片，其發音原理與竹笙相同，但演奏比較多樣化。葫蘆笙歷史相當悠久，也許因爲瓠類蔓藤植物結的果實——葫蘆，容易腐爛，難以長期保存，所以便產生其外觀與瓠完全相同的「銅葫蘆笙」。

銅葫蘆笙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曲管式」，一種是「直管式」。這裡的「管」是指「瓠」形，不是指笙的發音竹管；如葫蘆底球狀與頸（吹管）成一直線的，稱爲「直管式」，如果頸是彎曲的，便是「曲管式」。我想利用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廿八「壺盧」的圖繪（圖三七），似可將直管式稱爲「瓢」笙（讀音「嫖」）笙，曲管式稱爲「匏」笙。「葫蘆笙」當初命名，就是根據形像，我如此擬名，可供後人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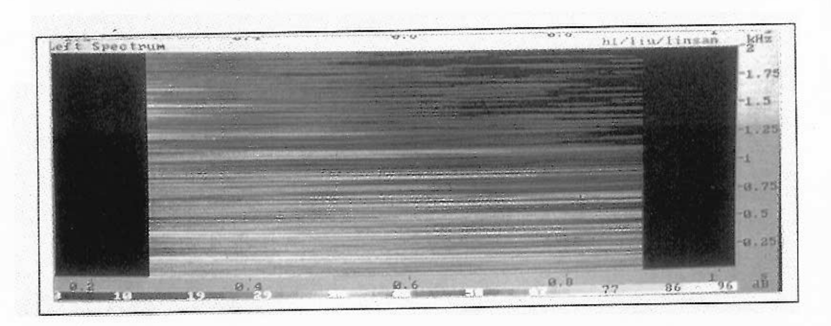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雲南省滇池南面江川縣李家山二十四號墓，出土兩件曲管式青銅葫蘆笙（圖三八），編號（M24:40a），笙斗均爲曲管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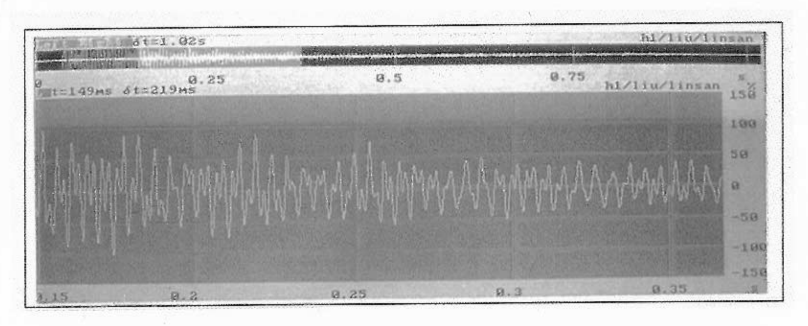
靈山型銅鼓聲波圖



靈山型銅鼓聲音瀑布圖



靈山型銅鼓聲譜圖



靈山型銅鼓基音曲線圖

▲圖三三—三六　靈山型銅鼓「聲波」「聲波瀑布」「聲譜」「基音曲線」彩色圖版（採自劉客養碩士論文）

狀可插七八根木質管子，現已腐朽。在彎曲管頂，有立體水牛一頭，兩角昂然精力充沛，造型優美，實爲音樂與銅雕藝術結合品。此器爲戰國時期文物，可見銅葫蘆笙發展時代甚早。

一九五六年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十七號墓，出土直管式青銅葫蘆笙（圖三九），編號（M17:9），直管頂端正面焊鑄一隻猛虎伏在一頭牛的背上，在動物影片中，常常看到這種弱肉強食的場面，此種造型，似意在表現統治者的權威，令人油然生惻隱之心。這笙管背面有六個長方形孔，第一孔直通正面，直管另一端焊接一個桃形的勺（笙斗）。這直管銅葫蘆笙是西漢時期音樂文物。

石寨山十六、十五號墓，也出土曲管葫蘆笙三件，形像酷似瓠狀，頭細長彎曲有一孔，下端呈圓瓠形，瓠的正面開兩排橫孔，上排四孔，下排三孔，孔之間互相串通，應是西南夷典型葫蘆笙。雲南省祥雲縣大波那木槨銅棺墓，也出土與石寨山形式相若曲管葫蘆笙二件，瓠部無孔，有複線弦紋，形式較爲原始。

青銅葫蘆笙時代，大致是春秋中晚期迄至西漢早期（西元前五世紀中期～前世紀後期），綿延了四百年之久，其形制變化也不太大，至西漢以後就絕跡了。

曲管式銅葫蘆笙，與直管式銅葫蘆笙，是兩種不同的樂器，形制構造不同，吹奏方式也不同：曲管笙吹奏，類似現代的蘆笙；直管笙的背面開了六個長方形孔，即爲按孔，正面一個大圓孔，可插入若干吹管，敞口桃形的勺斗，是起音響作用的，吹笙時是橫棒著的。這兩種笙的演奏方式，請參閱本稿二～四節＜錞于＞圖十三，那件八人樂舞銅扣飾，下排第一、四樂師，便

本草綱目　卷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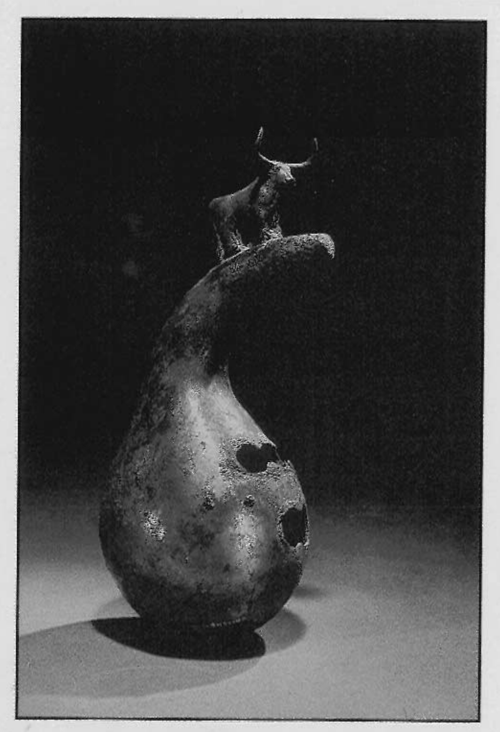
壺盧

諸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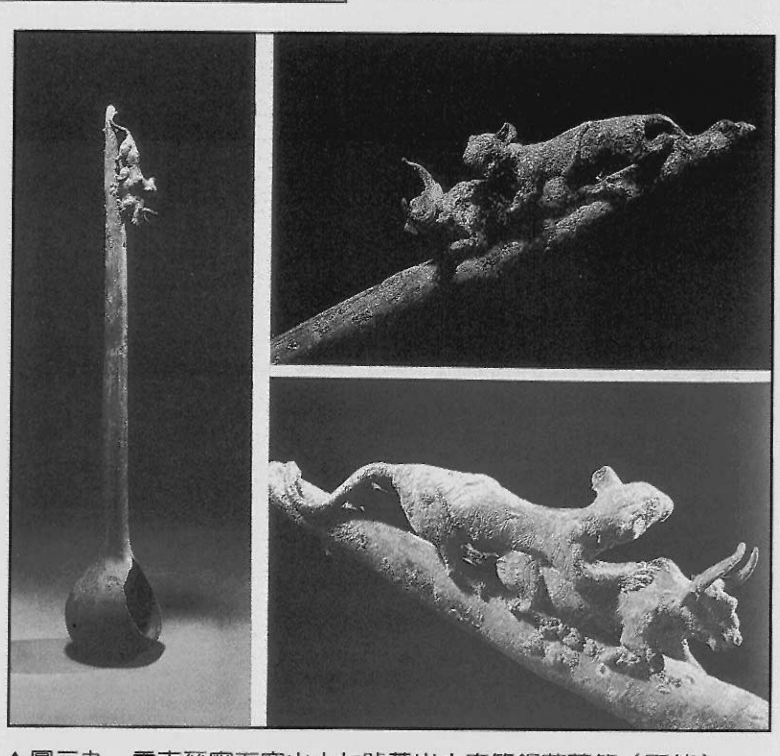
匏　蒲盧　瓠　瓢

【集解】弘景曰瓠與冬瓜氣類同輩又有瓠瓤亦是瓠類小者名瓢食之乃勝瓠此等皆利水道所以在夏月食之大約不及冬瓜也恭曰瓠與瓠瓠冬瓜全非類例三物苗葉相似而實形則異瓠形似越瓜長尺餘頭尾相似夏中便熟秋末便枯瓠瓤形狀大小非一夏末始實秋中方熟取其爲器經霜乃堪瓠與甜瓠瓠體性相類啖之俱勝冬瓜陶言不及是未悉此等原種各別也時珍曰長瓠懸瓠壺盧匏瓜蒲盧名狀不一其實一類各色也處處有之但有遲早之殊陶氏言瓠與冬瓜氣類同輩蘇氏言瓠與瓠瓤全非類例皆未可憑數種並以正二月下種生苗引蔓延緣其葉似冬瓜葉而稍團有柔毛嫩時可食故詩云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五六月開白花結實白色大小長短各有種色瓤中之子齒列而長謂之瓠犀竊謂壺匏之屬既可烹曬又可爲器大者可爲甕盎小者可爲瓢樽爲要舟可以浮水爲笙可以奏樂膚瓤可以養豕犀瓣可以澆燭其利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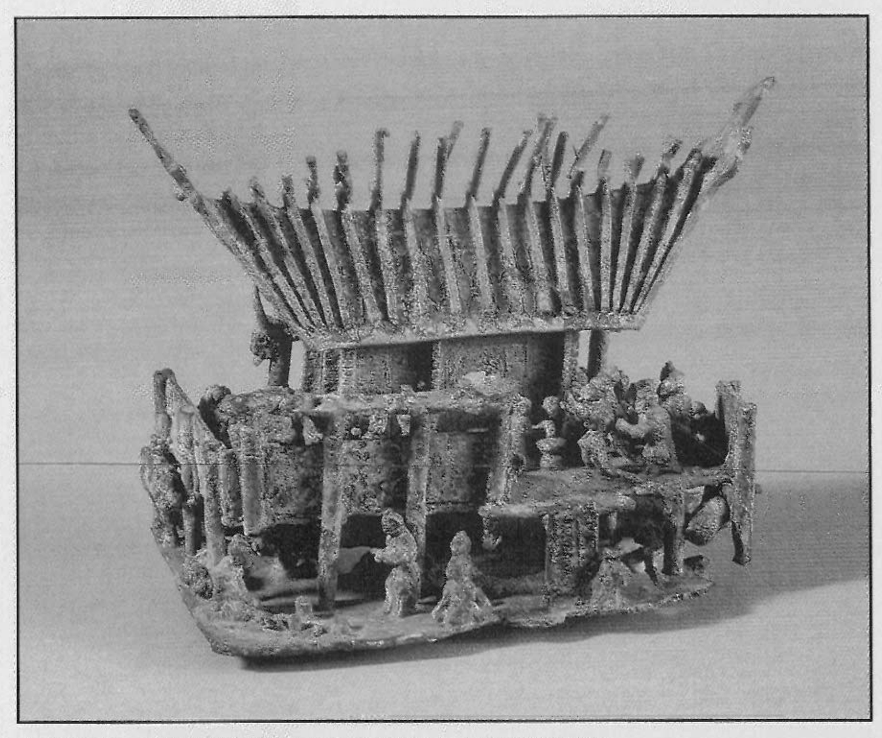
▲圖三七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壺盧」書影



▲圖三八　雲南江川李家山二十四號墓出土曲管銅葫蘆笙（匏笙）



▲圖三九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七號墓出土直管銅葫蘆笙（瓢笙）



▲圖四十　雲南晉寧石寨山六號墓出土人物屋宇銅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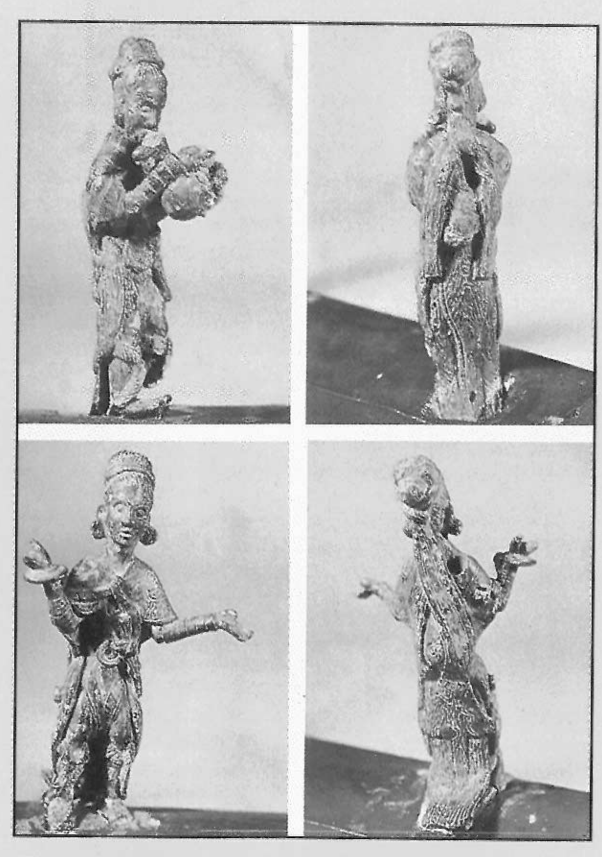
是演奏真實情形（＜雲南出土銅葫蘆笙探討＞，葛季芳撰，一九八七年，考古，九期，八二一～八二五面）。

唐宋時代無銅葫蘆笙，而有「瓢笙」，見於《舊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詔＞上：「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釂。」《宋史》卷四九六＜蠻夷西南諸夷＞：「一人吹瓢笙如蚊納聲。」明清兩代常稱葫蘆笙爲「蘆笙」；這可能有點疑義；「蘆笙」在宋人稱爲「盧沙」，相當於古代的「排簫」。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瑤人之樂有『盧沙』、『銃鼓』、『葫蘆笙』，……盧沙之制，狀如古簫，編竹爲之，縱一、橫八，以一、吹八，伊嚘其聲。葫蘆笙攢竹於瓢，吹之嗚嗚然。」（四庫全書本）現代聚居在雲南瀾滄江的拉祜族，最擅長吹奏葫蘆笙，跳葫蘆舞，他們將葫蘆笙用作獨奏、合奏，伴奏，吹笙舞蹈的肢體動作，達三四十種之多，有「歌舞音樂的海洋」美譽，在雲南其他少數民族也都熱愛這種器樂（＜葫蘆笙＞，李昆聲、秦序撰，一九八〇年，文物，八期，八五～八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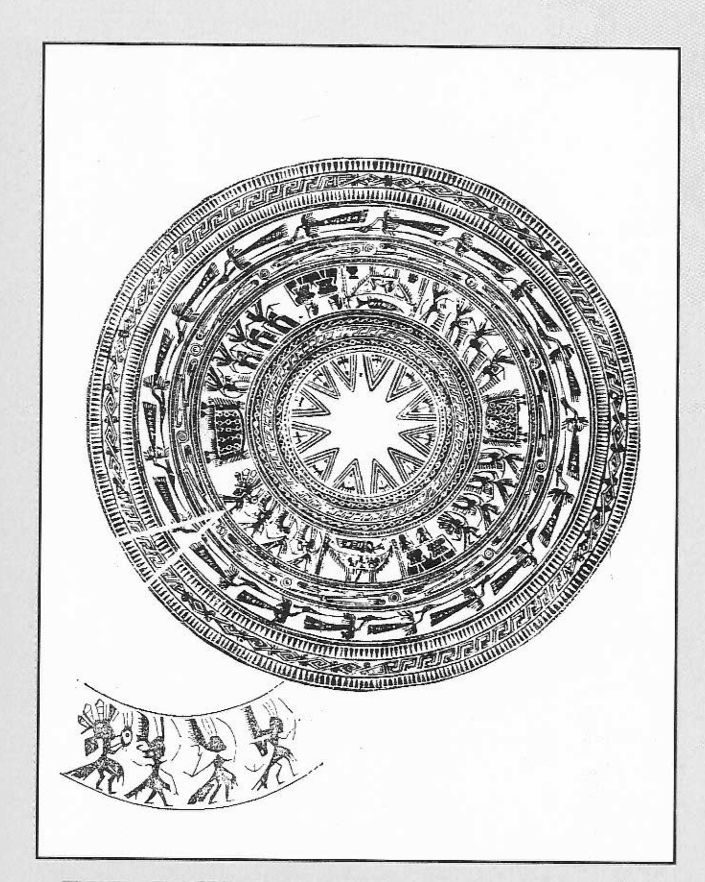
銅葫蘆笙在漢代如何演奏？卻流傳下來許多文物資料：除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八人樂舞銅飾」以外，還有江川李家山出土銅杖一件，編號（M24:66），杖頭上飾雕一件銅鼓，銅鼓上坐著一滇人男士，頭頂束髻，對襟衣衫，雙手捧著曲管葫蘆笙吹奏，銅鼓下方爲雙蛇交結纏繞。古代滇民以蛇象徵土地資源，有土斯有財的民生觀念。又，石寨山出土「人物屋宇銅飾」，編號（M6:22），爲祭祀——孕育儀式，此屋宇迴廊上有十三人，有擊銅鼓、吹葫蘆笙，或閑坐或倚欄而立。欄板上置食物，炊事者數人。惜此器鏽蝕，圖版效果欠佳（圖四十）（參考葛季芳文，及石寨山發掘報告、雲南省博物館等書籍圖錄說明）。石寨山十七號墓出土蘆笙舞銅俑，編號（M17:23），樂舞者四人，一人抱葫蘆笙豎吹，吹的是曲管葫蘆笙；餘三人手舞足蹈，舞姿翩翩，神情愉快。這四位樂舞者，服飾基本相同，均挽銀錠式髮髻，繫以長帶，戴耳環，腕鐲、臂環，佩短劍，腰束帶，腹前綴圓形扣飾。穿三角短褲，背披獸皮披罽（讀「寄」音，氈類）。衣後擺長及地，兩膝下各束一帶，跣足。服飾輕盈飄逸，裝扮華麗。每件銅俑高八・五～七・五公分（圖四一）（《雲南省博物館》圖版說明一七六面）。

晉寧石寨山出土音樂文物真多，在銅雕之外，還有一件銅鼓的殘片，編號（M13:3），銅片上發現一組「笙歌」圖像，鐫刻紋飾極爲生動。畫面爲一隻船，站立四個著滇人服飾的女子，面向船頭，一女子吹曲管葫蘆笙，眾人應和著蘆笙的樂聲，拍手唱歌（圖四二），十分快樂的樣子。在船的前方有兩隻水鳧浮游著，水鳧下還有幾條魚，使畫面充滿生氣。我想這些樂人，僅限於在船上高歌，如果跳躍起舞，會使船的重心不穩，造成危險，所以，這幅圖像不是「樂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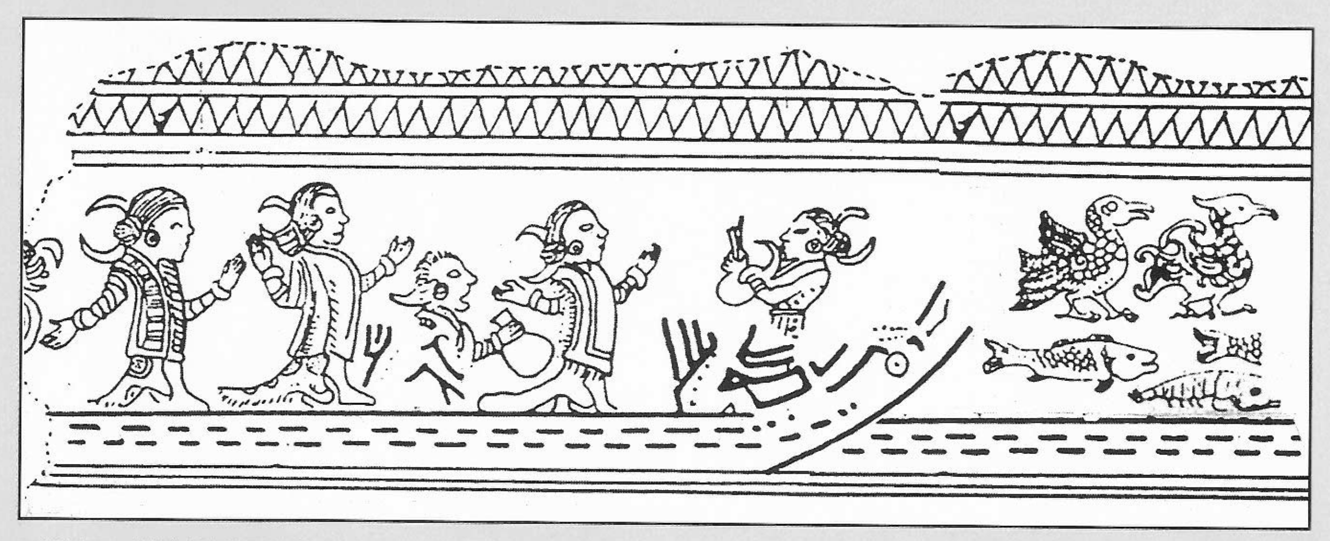
雲南省開化縣出土一面銅鼓，它的暈飾非常有名，學界稱爲「開化銅鼓」。鼓的主暈部分有「匏笙舞」花紋，我們以這「干欄式」屋宇爲中心，兩根支柱，屋角高翹，左右圖案對稱。屋內有二人競吹葫蘆笙，屋宇左邊高台有銅鼓二面，二人正在揮棒擊奏；再左有四人跳舞，頭戴羽毛，衣後拖長幅，手執盾牌；再左爲一架「編鑼」共十八件。屋宇右邊也有舞者四人，服飾與左邊相似，其中一人（最右一人）頭戴牌冠，雙手捧曲管葫蘆笙演奏，他可能是巫師之流，整個場景極爲熱鬧（圖四三）。其中的「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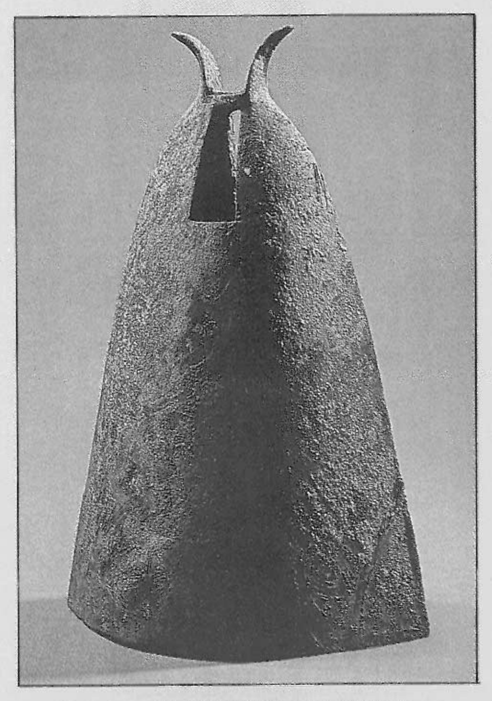
▲圖四一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七號墓出土銅樂舞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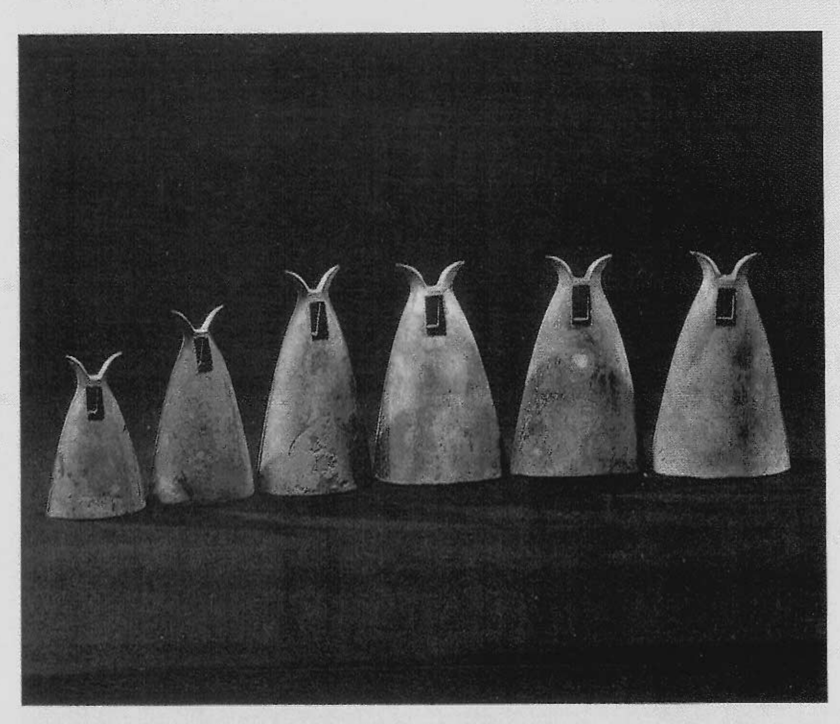


▲圖四三　雲南開化銅鼓匏笙舞紋飾



▲圖四二　銅鼓殘片笙歌紋飾


▲圖四四　廣西容縣出土羊角鈕鐘


▲圖四五　雲南楚雄萬家壩一號墓出土羊角鐘

鑼」是唯一現存珍貴見證。

以上銅葫蘆笙吹奏與舞踊圖例，凡六處之多，可見這件器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的程度。也帶給研究工作者十足的證據。

（五）羊角鈕鐘

羊角鈕鐘（圖四四）擊奏體鳴樂器，是漢代百越及西南夷地帶青銅合范鑄造的鐘形樂器。驟視像是半截橄欖樣子，上面尖下面大，頭頂上有倒八字形的鋬鈕，鈕下有一個長方形的透穿孔，鐘口平齊，其橫斷面也呈橄欖形。鐘體略顯修長者居多，腹胴中空，內壁光滑，敲擊其「隧」部與「鼓」部，有的可以發出兩個不同的聲音。這種樂器在現存傳世的金石著錄中，未見敘述；最初發現，有人以爲是大象挂的鈴鐺，曾稱爲「象鈴」，後來陸續出土，被稱爲「銅鐸」、「銅鈴」、「編鐘」，但因其特徵在頂部岐出一對鋬鈕，很像羊子的角，所以被稱爲「羊角鈕鐘」或「羊角鐘」，雖然未必正確無誤，也頗能表達其形像實況。

羊角鐘最早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越南河北北口出現二件，迄至一九八四年見於蔣廷瑜<羊角鈕鐘初論>（文物，五期，六六～六九面），共發現十處二十七件，鐘形長短粗細不一，最大一件爲廣西西林普馱屯鐘（高二八公分），最小一件爲雲南楚雄萬家壩鐘（六件中最小高十五公分），一般均在二〇～二四公分之間。越南北部的鐘，有兩隻長喙長尾翔鷺，廣西貴縣羅泊灣鐘，有人面紋，除這兩件有紋飾外，其餘都是素面的。

一九七五年雲南省楚雄縣萬家壩城東川江支流青龍河西岸二級台地上，發現古代墓葬群，計大小土坑豎穴墓七十九座，一號墓(M1)可能是靡莫族或昆明族的西南夷「邑君」或「侯王」的墓葬，出土羊角鐘（圖四五）六件。這組鐘用金屬槌敲擊測音，除第五件已破裂外，其餘皆完整，敲出清朗的聲音（並非雙音鐘），也許因斷面呈核桃形而接近於圓形之故。第五件羊角鐘破裂經銲接後測驗，也可發音，下面是這六件羊角鐘實測頻率（表四六）可見西漢時期的西南夷，即二千年以前漢族以外，少數民族音樂（包括樂器），已不侷限於五聲音階了（<楚雄萬家壩古墓群發掘報告>，雲南省文物工作隊撰，一九八三年，考古學報，三期，三七六～七面）。

此外，在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六號墓出土羊角鐘一件，廣東廣州也出土一件，其餘都在廣西省西林普馱屯、北浦大嶺腳、容縣龍井北、貴縣羅泊灣，早期越南皆有出土，它的時代由戰國迄至西漢，即西元前五世紀至前一世紀四百年間，其地域東到廣州，南到越南的興安，西到雲南的楚雄，主要是西江流域與紅河流域，在西江以北紅河下游平原以南未發現。這些地

器　名	器　號	音　高	頻　率
羊角鐘	1:13-a	#a +20	471.58
羊角鐘	1:13-b	c -4	522.04
羊角鐘	1:13-c	ḋ -38	574.58
羊角鐘	1:13-d	#ḋ +6	621.41
羊角鐘	1:13-e	ė -60	636.80
羊角鐘	1:13-f	#ċ +17	1056.8

▲表四六　雲南楚雄萬家壩一號墓出土羊角鐘實測頻率表

方跨石寨山型銅鼓，與北流型銅鼓（在廣西省北流縣）的分布區，正是古代銅鼓分布中心地帶，從羊角鐘與銅鼓相伴同時出土，有些羊角鐘紋飾如越南鐘，與石寨山銅鼓紋飾，其長喙翔鷺紋是相類型的，無疑羊角鐘與銅鼓有著密切關係性。（＜羊角鐘初論＞，蔣廷瑜撰，見前著錄）

羊角鐘是一種極古老而富於地方特性的樂器，它體積不大，在當時可能六件一組，用繩子套在長方形穿孔掛在架子上，由樂師演奏；可惜未發現任何有關它的演奏圖說。近年有音樂家，用古琴為主奏旋律，以羊角鐘擊節伴奏，可以奏出獨具地方風格美聽樂曲來。

（六）銅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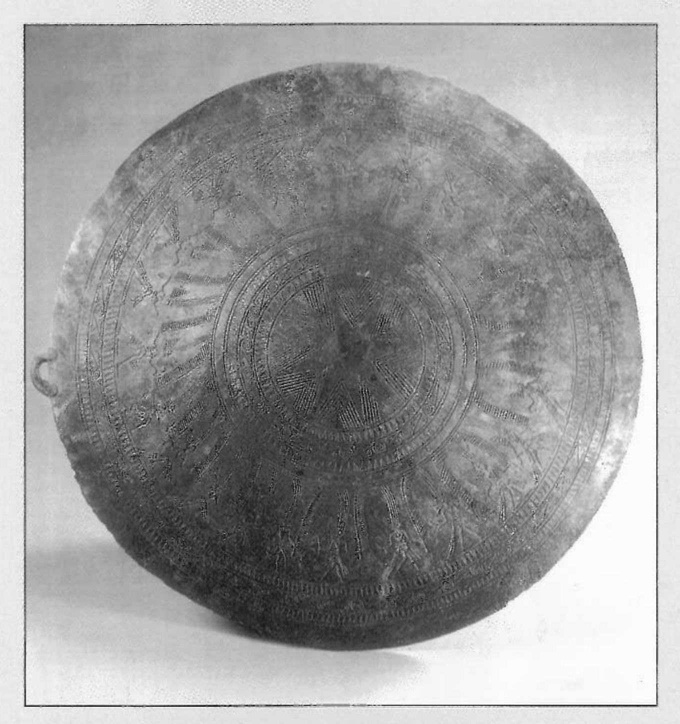
銅鑼——銅製擊奏體鳴樂器，其前身與青銅樂器的「鉦」有密切關係，請參考本稿二～(一)節鉦的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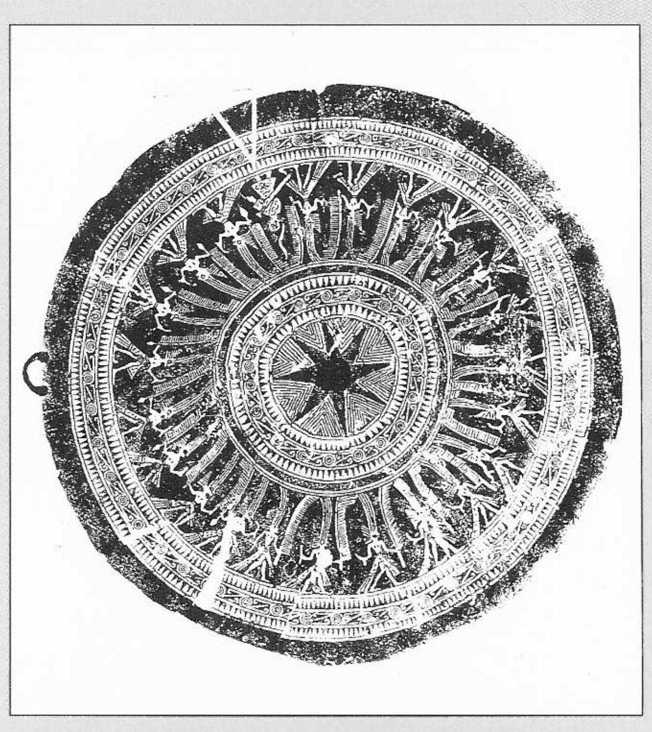
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四＜樂＞四：「近代有如大銅疊（即「碟」字）懸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當時沒有「鑼」這個樂器名辭，相當於杯盤碗碟之類的「碟」子（銅製）掛起來敲擊的形象，稱之為「鉦」。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三四＜樂＞七：「今太常鼓吹部用之（鉦），……以蛟龍為飾，下有趺，中懸鉦，鉦形頗如銅鑼。」同上書卷：「銅鉦，鉦如大銅疊（似銅盤——原注），懸於簨而擊之，南蠻之器也。」「南蠻」就是西南夷。明清兩朝鹵簿鼓吹樂有「大樂鉦」就是「鑼」的性質，還有凱旋鐃歌樂也有「鑼」，形制與現代樂器中的鑼相同（《皇朝禮器圖式》卷九）。宋陳暘《樂書》卷一二五＜銅鑼＞：「自宣武以後（北魏宣武帝五〇〇～五一五年間），始好胡音，洎於遷都，屈茨（就是「龜茲」）琵琶五絃、箜篌、胡簧（疑為「箏」）、胡鼓、銅鈸、「打沙鑼」，其聲大抵初頗紛綜而轉躁急，蓋其音源於西域，而被之土木，」這是銅鑼以往最原始的文獻記載，《文獻通考》亦抄錄此說。

一九七七年浙江省嘉興縣西門，在一口古井中發現一面銅鑼，直徑五一公分，鑼的背緣鑿有兩行文字：「知府節制余右司自內庫修使用」、「嘉興府咸淳四年三月初一日」，此年為西元一二六八年，正是元代雜劇作家孕育時期，距今七百餘年，距陳暘進《樂書》約晚一百六十年。（〈浙江嘉興發現宋銅鑼〉，嘉興博物館撰，一九七八年，《文物》三期，二五面）

一九五六年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第十二號墓發現笠帽狀銅器一件，兩側有半環形耳，但已缺一耳，出土時稱此器為「鑄鼓形雙蓋銅貯貝器——第一層蓋子」（發掘報告），又作「上倉紋貯貝器第一層蓋」（雲南省博物館圖錄），直徑五二．二公分，器面紋飾略似銅鼓：面上中央鑄作八角光芒，每二角之間夾以復線三角紋，其外作三角齒紋，及圓渦紋組成的帶紋一周。再外為主暈，暈中飾羽旌舞，舞者二十三人。領舞者身穿龍紋長袍、跣足、髻上飾翎，佩長劍。其餘諸人皆戴高冠，持羽旌，有的旌下墜一物、上身裸露，下身繫後幅之裙狀物。構圖規整，舞姿優美。最外亦類似芒周三角齒紋及圓渦紋（《雲南晉寧古墓群發掘報告》七七面、《雲南省博物館》圖版說明一八七面）。這件「器蓋」後來在《中國音樂史圖鑑＞（四六面）稱為「銅鑼」（圖四七）（圖四八），與「開化銅鼓」面部主暈圖並列；該銅鼓圖形已徵錄於本稿三～(四)節＜葫蘆笙＞吹奏第四三圖：「屋外有一木架，上分三排懸圓形物十五個，此為『編鑼』。」根據出土銅器蓋有「兩耳」環，其聯結情形正與木架上編鑼懸掛情形吻合，這種認定可以成立，只是未見音響測試結果？

一九七六年廣西省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銅鑼一件，編號（M1:33），圓盤形類似篩子，面平，鑼身較薄，近邊處有一道鑄痕，邊緣呈弧形稍內斂，邊上有一道突起的繩紋，並有三個供懸掛的小耳環，鑼面徑三三．五公分，面有「布」字刻紋——表示漢代鬱林郡布山縣——貴縣的古地名。這座墓根據出土器物研究，可能是漢代南越國桂林郡最高官吏的墓葬。這面鑼音高：253.44Hz，即在中央八度C


▲圖四七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二號墓出土銅鑼


▲圖四八　雲南晉寧石寨山十二號墓出土銅鑼拓本

下一度稍高。(《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三〇面)由於這面銅鑼出土，證實了石寨山銅器蓋乃是一面漢代「銅鑼」。

從前學者多以爲中國之鑼，爲六世紀初年由後魏經西北傳入的，自此文物出土，爲音樂史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四、正史中西南夷的音樂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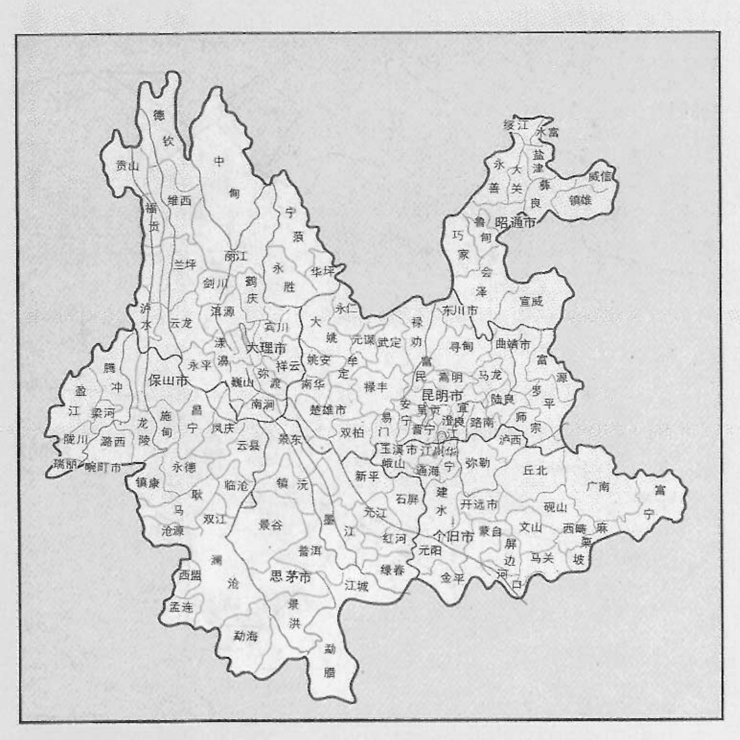
本稿敘述漢代擊奏樂器及西南夷音樂，由於該地區出土音樂文物資料翔實，形成西南夷少數民族音樂論述的比重增加，尤其在銅鼓方面非常特殊。西南夷原以爲地處一域，領域也非廣袤，史書常將其劃在「夷」「蠻」列傳中，詎料其開發甚早，深受華夏文化影響之外，還保持其民族特質與自我意識，從出土文物的形式觀察，無論其造形、紋飾、運作都具有濃厚地域性風采，使我們探索到它的「音樂」——歌唱、舞蹈、戲劇(「俗好巫鬼禁忌」巫覡本爲戲劇之源)，盛況空前絕後，由冶銅、雕塑、繪畫技能發達，表達在器物上是莊嚴的美學要求，將裝飾藝術審美觀與精神文明，推向新的高峰，媲美中原文物，在我們欣賞這些音樂文物，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先民，有了重新認識。

現代，中國大陸西南少數民族區域，在漢朝是以滇族爲中心，時稱「西南夷」。魏晉南北朝時期，因新的生產關係，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封建世家大族，其中以「孟」、「霍」、「李」、「爨」最顯赫的四大家族，時稱「南中大姓」，包括雲貴及四川南境。唐宋時期，以彝族、白族先民爲主體，先後建立兩個地方政權，時稱「南詔、大理」，這段時期，還未曾見到重要文物出現，暫不予以敘述。茲將正史中有關於漢代西南夷以來，歷朝所見音樂文獻列後，以見其源委(參考《雲南省博物館》圖版說明)。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前一〇九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忲(奢侈)，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可見滇池一帶土地肥沃經濟繁榮之盛。

「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原住民多喜歡歌舞，於今猶然。

「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



▲雲南省地圖

地下濕，皆多瘴厲，人尤夭折。……其俚人則質直尙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群情推服。」（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此段文字，亦見於《後漢書・馬援傳》注引自斐淵《廣州記》（佚），宋《太平御覽》嘗輯錄此說；《宋史・蠻夷傳》亦有此語，文字有異同處。

「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數百里，……皆自營生業，無賦稅之事。謁見貴人，皆執鞭而拜。有功勞者，以牛馬、銅鼓賞之。……婚姻之禮，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慚，逃避經旬方出。讌集則擊銅鼓，吹大角，歌舞以爲樂。」（舊唐書卷一九九南蠻西南蠻列傳）此際「銅鼓」是多用途之物，可以酬庸，也可以作樂器娛樂。

「俗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瓜、椒、蘐（蒜）和之，號鵝闕。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釂。以繒帛及貝市易。」（新唐書卷一二二上南蠻上南詔上）又（同書卷一二二下南蠻下南詔下）云：「凡嫁娶，納檳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疑爲「銅」字）鼓、蠡。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沈之海。」南詔的音樂吹瓢笙侑酒，嫁娶時用樂器甚多，銅鼓爲其中之一，「蠡」就是匏笙或瓢笙。

「雍熙元年（九八四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擊銅鼓、沙鑼以祀神鬼，詔釋其銅禁。」（宋史卷四九三蠻夷一）又（同上書卷四九四蠻夷二）云：「淳化元年（九九〇年）洪替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遣其子淮通來貢銀盌二十，銅鼓三面，銅印一鈕，旗一帖，繡真珠紅羅襦一。上降優詔，賜絲百匹，還其襦。」溪峒夷人以巫師爲靈媒，替人診病，儀式進行中以銅鼓、沙鑼爲響器；銅鼓也是貢器。

「龍光進率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宋史卷四九六蠻夷四）唐宋時期瓢笙舞非常流行，如唐樊綽《蠻書》卷十：「南詔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閭巷，吹壺蘆笙或樹葉，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又「彌臣國（昆明族）……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頭置（銅）鼓，飲酒叩擊鼓，男女攜手舞蹈爲樂。」開化銅鼓主暈圖飾，即爲此說物證。

另外，在《宋史》卷四九六<蠻夷>四：長寧等十郡八姓及武都夷被朝廷剿平，其提點刑獄范百祿作效忠誓辭有云：「投其器械，籍入官府。百死一贖，莫保銅鼓。」全辭極長不錄，惟見銅鼓在賊酋手中，象徵權威標的物，沒有銅鼓就沒有其族屬領袖地位，生活如行屍走肉了。

「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年）楚雄府言：『所屬蠻民，不知禮儀。惟僰種賦性溫良，有讀書識字者。府州已嘗設學教養，其縣學未設。縣所轄六里，僰人過半，請立學置官訓誨。』從之。」（明史卷三一三雲南土司列傳）元代對於苗、猺、羌、番等少數民族，概授其酋首爲土官，民眾備受其虐待。明朝改土官爲流官制，土著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也有機會接受教育，民安於業，恭敬上官；官至，爭迎到家，刲羊

擊豕，婦女皆出羅拜。當然還有些頑固思想，表現銅鼓這樂器上。

「劉顯起故將郭安、宏大朝爲佐，調諸土兵，合官軍凡十四萬人。萬曆改元（一五七三年）三月，……郭成破雞冠，獲阿大（敘州蠻酋首）。諸軍攻杜豬，擒方三，阿二走，追獲於貴州大盤山。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大爲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顛，群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錄功，進（劉）顯都督同知。」

（明史卷二一二劉顯列傳）清朝初年因襲明制，置雲南省。雍正時有改土歸流之議，以鄂爾泰爲雲南巡撫，奏言：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先改流，自四年至九年（一七二六～一七三一年）蠻悉改流，苗亦歸附，滇黔少數民族振興文教，提倡音樂，促進開化，但純樸民風中殘餘的迷信思想行爲，也不是一朝一夕能驅除殆盡，至少「銅鼓」已不是威權的象徵，而是歷史文物，供人們欣賞與研究矣。

五、後　記

我於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在本刊第四十九期，開始用＜試以漢代音樂文獻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音樂史＞爲題，首先，以鐘、鼓樂器爲例，嘗試寫作。賡續數年來不斷鑽研，先後在本刊及＜故宮文物＞月刊，發表蕪文十五篇（本篇未計入），敘述漢代畫像石上的音樂問題，與管樂器類，弦樂器類，及本篇擊奏樂器類的音樂文獻，與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各階層音樂生活與習俗；其間似以＜漢代相和歌的傳衍＞及＜西南夷民族樂器＞這兩則，自以爲略有見地。本篇爲此一系列研究的「完結篇」，至於漢代出土樂器複製與聲學研究，俟有機會再行發表。此項論述，承大陸朋友來信勗勉，讚賞有加，實愧不敢當：本省友生來信或面敘，均經解答，並提供完整資料，供其深入研究參考。以一人肘案之力，而荷眾人推挽之情，深感朋友讀書之樂以外，特敬致謝意，尚幸指正。

重要參考書目

中國音樂史圖鑒　中國音樂研究所編　一九八八年　人民音樂出版社
中國音樂　趙渢編　一九九一年　現代出版社
中國樂器圖志　劉東升等著　輕工業出版社
中國音樂參考圖片（全）　中國音樂研究所編　一九五四年　音樂出版社
中國少數民族樂器誌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藝術研究所編　一九八八年　台北　音樂中國出版社
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樂器篇（全書皆敘述近數十年來出土鐘形樂器文物）　陳萬鼐編　民國七十四年　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東亞樂器考　日林謙三著　一九六二年　人民音樂出版社
中國青銅器全集（滇昆明）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一九九三年　文物出版社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　雲南省博物館編　一九五九年　文物出版社（全書二冊、報告與圖版分印、圖版八開大本）
雲南省博物館　雲南省博物館編　一九九一年　文物出版社
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　一九八八年　文物出版社
銅鼓藝術研究　蔣廷瑜著　一九八八年　廣西人民出版社
銅鼓和青銅文化的新探索——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古代銅鼓和青銅文化第二次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陳遠璋等主編　一九九三年　廣西民族出版社
馮漢驥考古學論文集　馮漢驥編著　一九八五年　文物出版社
廣西壯族銅鼓音響的研究　劉客養著　民國八十五年　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陳萬鼐指導）

本稿參考舊籍已詳列書名卷數，暨期刊論著等資料，均於各文字下注明，恕未列目。